

统计制度、抄录环境与核验技术：《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数据分析和校勘*

伍伶飞

内容提要：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于1918年至1921年间调查整理的基督教资料在流传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了五个相对常见的中英文版本，其中1922年英文版、1922年中文版、1987年中文版和2007年中文版的的数据均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将梳理各类数据的差异，分析相关原因，指出各个版本中的数据存在统计误差、计算错误、抄录舛误三个方面的问题，并以资料的第三部分《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为例，依据现有不同版本的资料对数据进行校勘。本文就这份基督教调查资料展开的分析和校勘，有利于更好地评估其价值并合理利用，也可以对深入认识和整理近代中国社会调查资料相关数据提供有益思考。

关键词：基督教 新教 调查资料 中华归主

一、引言

从1918到1921年大约四年的时间里，基督教（新教）组织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在司德敷（Milton T. Stauffer）的主持下，以基督教为中心对中国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实际上，这项调查还涉及山川、政区、人口、民族、经济、交通、语言、物产、教育、医疗等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与基督教直接相关信息的范畴。这些调查资料经汇集整理并在1922年推出中英文版本，英文版名为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中文名为《中华归主》，亦即《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在未特别指明版本和年份时，下文简称《基督教调查资料》）。《基督教调查资料》不仅在基督教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自马克斯·韦伯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命题以来，许多研究者将注意力投入到这一命题的证实或证伪当中。《基督教调查资料》的丰富调查数据在近代经济史领域、特别是涉及基督教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研究中被频繁引用。^①

根据笔者所见，这份调查资料先后有五个通行的中文和英文版本。

1922年版，英文，名为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②由中华续行委办会出版，编者在标题之后记录到：“这是一份由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在1918年至1921年间编制的关于中国基督教纸面实力和地理分布的综合性调查报告。”该版本是根据调查资料整理编纂的最初版本。

[作者简介] 伍伶飞，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厦门，361005，邮箱：lightship@qq.com。

* 本文为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近代东亚灯塔体系与航运格局研究”（批准号：ZK1170）的阶段性成果。

① Y. Bai and J. K. Kung, “Diffusing Knowledge While Spreading God’s Message: Protestantism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n China, 1840–1920”,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3, No. 4, 2014, pp. 669–698; 张博、胡金焱、马驰骋：《从钱庄到小额贷款公司：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历史持续性》，《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4期；吕朝凤：《金融发展、不完全契约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1期。

②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1922年版,中文,名为《中华归主》,这是翻译者陆士寅以及其他中文版编辑成员根据1922年英文版*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相关材料翻译和编制而成,^①包括英文版的正文六编(第二至七编)和“各省区县统计表”等附录三编,译文文字也有删削和改动。

1979年版,英文,名为*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②这是位于旧金山的Chinese Materials Center公司的重印版,该公司有多个系列出版物,本书为“重印系列”的第71种,通过对比发现,该版与1922年英文版在数据上无明显区别。

1987年版,中文,名为《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分上、中、下三卷。该书内容有两部分来源,一是1922年中文版,二是蔡咏春等人根据1922年英文版翻译的前述中文版中所没有的内容。该版上册扉页标记为1985年2月出版,部分上册封底还有“内部资料”字样;^③下册版权页显示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有“内部发行”字样。^④该版在封面装帧上有多种风格,不过内容均保持一致,上册在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请北京外国语学院(今称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制,中、下两册在1987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尽管上册出版于1985年,但为行文方便,统称1987年版)。^⑤

2007年版,中文,名为《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分上、下两卷,标注为“原《中华归主》修订版”。在2007年版中,译者指出,1987年版印量很少且各卷并非同时推出,上册曾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分赠给有关研究单位或个人,没有销售”,而中、下两册为“内部发行,宗教所没有像上册那样分赠”,^⑥流传和使用受到局限。而2007年版则上、下卷同时推出,在海内外均流传较广、引用较多。该版本是基于1987年版“翻译中的缺点和错误”而做出的局部修补;正如2007年版“重印说明”中所述,由于1922年英文初版印刷质量不佳、1987年排版和校对方法的问题,尽管2007年版已“尽力校对,错误仍肯定不少”。^⑦实际上,通过比对发现,不止2007年版本本身仍存在问题,其与1922年中文版、1922年英文版和1987年版的内容均存在一定差异。

该资料各版本差异引发了对其可靠性的思考,早在1958年舒新城即于一篇对该资料介绍和分析的文章中指出其“比较原始而可靠”,^⑧后来的研究者也往往对该资料评价较高、将资料中的统计数据作为比较可靠的材料加以利用。实际上,《基督教调查资料》内容丰富,大体上可分为文字描述和统计数据两部分;由于各种原因,《基督教调查资料》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多种版本,而各版本的文字描述、统计数据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别。中文各版的译者在文字的翻译和校勘上做了重要贡献;对统计数据的核对和校订则是《基督教调查资料》校勘工作的另一个需要完成的部分,到目前为止,已有研究尚未涉及对其统计数据的全面校勘。

该资料不同版本数据存在的问题,必然会对运用这些数据的相关研究产生影响。为更好地认识和利用这份资料,下文将以2007年版、1922年中文版、1987年版和1922年英文版中的数据为中心,根据数据所存在问题的不同特点进行分类讨论,评估相关数据的可靠性,并对部分数据进行校勘。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前述《基督教调查资料》四个版本数据的初步整理和分析,可以将相关数据存在的问题与

①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页。

②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1979.

③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年版。

④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⑤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下)“重印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下)“重印后记”。

⑦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下)“重印后记”。

⑧ 舒新城:《“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中国近代史资料简介》,《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

版本形成时代的统计制度、抄录环境与核验技术建立起密切关系,下文将分三个方面对数据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展开具体分析。

(一) 因调查方案或统计方法问题产生的数据误差或缺陷

诚如编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本书资料来源很多,差异很大”,^①包括1920年前每年由鲍引登(C. L. Boynton)主编出版的《中国基督教差会指南》、各差会干事每年报送的年度统计报告、各地宣教会的出版物、各界权威人士所写的有关中国情况的书刊杂志等。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1918年秋开始通过向全国各宣教会发送调查地图和统计表格。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的爱丁堡会议续行委员会出版的统计报告为这项调查报告的表格框架奠定了基础,^②而鲍引登担任了调查委员会的统计干事负责回收统计表格,其在此前多年都有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发表他的统计表格,^③他所积累的经验和保留的数据对调查工作有重要借鉴意义,这一点也在“序言”中被特别强调。^④

1918年,对照在印度局部地区进行的调查计划,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做了一系列准备之后,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正式开始。为保证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调查者针对每一个调查项目都追问两个问题:是否有必要进行一次调查?能否获得关于全国的准确情况?^⑤但最终的资料仍存在许多因调查方案或统计方法问题而产生的数据误差或缺陷。

其中,各地宣教会无回报或回报不完全是导致数据存在缺失或缺陷的最主要原因,这种情形的产生与调查工作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根据调查工作的总体方案,由调查委员会向全国各宣教会会长或干事发出调查地图与统计表格,由调查委员会派往各地的150多位通讯员进行通讯联系和收集调查结果。^⑥也就是说,调查委员会获得资料的丰富性和可靠性受限于各地宣教会的统计制度完善程度、对这项调查的积极性。实际上,各地宣教会对各差会总堂的建立时间等信息做了回报的比例仅超过三分之二,^⑦对受餐信徒人数做出回报的布道区比这一数字要高,为四分之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国特别是西部一些实际有基督教工作的省份,其各县情况在统计数据中没有显示,原因在于通讯员没能提供每个县传教事业的统计数据。如1922年英文版第三章第十节第四表“江苏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教会学校表(Extent of Occupation-The Christian School)”,^⑧其初级小学校女生数、高级小学女生数、中学以下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三项总数(Grand Total)均低于各宣教会相关数字的加总数;1922年中文版、^⑨1987年版^⑩和2007年版^⑪的相关数字与英文版相同。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由于沪济良所“回报不完备(Incomplete returns)”,故统计表中未将该宣教会的数字纳入总数(Grand Total),这种统计口径不同产生的误差使得外国职员加总数大于总数。总的来看,长江的九江以下沿岸地带、河北南部和吉林有少量存在,其余未知开始工作时间等信息的县份几乎都集中在西部的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在附录一“各省基督教事业统计表”的末尾,调查者特别指出:

我们在西部一些省份的通讯员不可能提供每个县区传教事业的统计数据,因此,本调查委员会只好使用了各总堂提交的传教事业统计回报,但回报中的数据都是归纳的各总堂所在县区

①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序言”,第15页。

②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序言”,第6页。

③ 中华续行委员会编:《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5期,广学书局1918年版,第251页。

④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序言”,第19页。

⑤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4页。

⑥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11页。

⑦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698页。

⑧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143.

⑨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3编,第111页。

⑩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第306页。

⑪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387—388页。

的事业统计。这样一来,目前实有传教事业的县区上表中却没有统计数据。所以,在对甘肃、贵州、云南三省以县为单位进行传教事业对比研究时,应注意这种不理想的数据归纳情况。^①

另一种统计上的问题是因统计口径不同而产生的。如1922年英文版中,第一章第三节第一表“各省人口统计表(Population of Provinces)”中,^②1885年国家税收统计和1920年邮局统计均出现“总计”项与各省相加数值不一致的情况;1987年版的对应表格^③和2007年版的相关数字^④与英文版相同(1922年中文版无此表格)。查1885年国家税收统计和1920年邮局统计中,直隶、山西和全国人口总计三项均有标注“按本省原有面积统计”,而其他省份的统计则包括了别的省份的一部分面积中的人口,各省之间存在统计口径差别。再如1922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十节第六表“江苏省基督教事业强弱表(Degree of Occupation and Table of Urgency)”,^⑤其外国职员总数(Grand Total)为938人,而宣教会外国职员数的加总数则为776人;1922年中文版、^⑥1987年版^⑦和2007年版^⑧的相关数字与英文版相同。总数与加总数差别的产生,原因在于外国职员总数(Grand Total)“代表全省西职员总数;然本项中有数宣教会之西职员总数,较各会原数减少,则因其总务机关之各西职员不在内”,^⑨这种统计口径不同产生的误差使得外国职员加总数小于总数。

如上所述,各地宣教会回报数据的完备程度和各个地方、各类主题数据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数据存在误差甚至缺陷,因此对数据的使用需要格外小心。

(二) 早期版本因技术手段不足产生的计算错误

由于缺乏便捷可靠的数据计算工具,使得近代各类调查统计存在诸多因技术手段不足而产生的计算错误。即便对新制度和新技术接受度很高的近代中国海关,其统计科也晚至1932年才进入“机算时代”,开始“采用机器整理,计算每月贸易统计”,^⑩技术手段的不足使得以系统性和可靠性著称的近代海关贸易统计数据也不免有诸多计算错误。^⑪类似的问题在《基督教统计资料》的1922年英文版本的数据中也多有出现,且在后期版本中未被很好地加以校正。

1922年英文版中,第一章第四节的“中国铁路概况表(Railroad Communications)”中,长江以南各省人口数方面,各省人口加总的数字为155 650 000人,而表格“总计”项下相应数字为155 630 000人,二者相差2万人;全国各省人口数方面,各省人口加总的数字为369 484 000人,而表格“全中国”项下相应数字为370 484 000人,二者相差高达100万人。^⑫1922年中文版不包括此表格,1987年版对应栏目^⑬和2007年版相应表格中的数字与1922年英文版保持一致。^⑭由于“中国铁路概况表”相关文字并没有对表中人口数据不自洽做出原因说明,更重要的是“中国铁路概况表”中同类型数据即“长江以北”各省的人口加总的数字与表格“总计”项下相应数字完全相同,所以可以认为,长江以南人口数字的不自洽,应当是数据整理和制表过程中发生的计算进位错误。

①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下),第1369页。

②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12.

③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第28页。

④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64—65页。

⑤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145.

⑥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3编,第112页。

⑦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第311页。

⑧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394—396页。

⑨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3编,第112页。

⑩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页。

⑪ 吴松弟、伍伶飞:《近代海关贸易数据摘编本存在的问题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

⑫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14.

⑬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第36页。

⑭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73页。

(三) 后期版本流传中产生的抄录舛误

以目前所见,1922年中文版译自英文版,二者数据中存在疑问或有舛误之处总体保持一致,与前面两者差别较大的是1987年版和2007年版。根据1987年版“汉译本新版序言”的说法,在蔡咏春翻译了1922年中文版所未翻译的部分后,世界宗教研究所组织人力校订并补译了“旧译本”即1922年中文版;^①但从1987年版中与1922年中英文版相同的数据问题来看,这项工作应当并不包括对相关数据的校正。1987年版基本是手绘表格,在翻译和重制表格的过程中缺乏较好的技术条件用于数据整理和核验,使得1987年版延续了1922年中英文版的错误,且传抄中新出现的舛误也难以被发现和修正;2007年版是对1987年版部分文字修订后的版本,并重制了表格,但2007年版不仅同样未能全面订正旧版数据错误,反而在录入中又新增了更多错误。

首先看1987年版。该版在“补译”1922年中文版未译部分基础上而成,故可以确信1987年版第二至七章的内容主要来自1922年中文版,1987年版第二至七章的表格数据应当也是根据1922年中文版相关表格重制。对照1922年中文版和1987年版可以发现,一是1987年版问题较为集中的数据正是1922年中文版所包含的第二至七章;二是1922年中文版中存在不少数字模糊之处,而1987年版中出现的抄录舛误与1922年中文版的模糊不清之处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例如,1987年的第三章第九节江西省的教会学校表中浸礼会的初级小学男生人数为156人,而1922年中文版相应表格中为155人,但数字“155”则由于印刷质量较差的原因、确实已模糊至难以辨识。

再看2007年版。该版继承了1987年版错误,更有为数不少新的舛误出现在2007年版中。例如,1922年英文版第七章第三节第一甲表中有表格“外国职员之宗派(Classification of Foreign Force)”,^②其各项数字均可自洽;1922年中文版^③以及1987年版相关栏目^④与1922年英文版的数字保持一致。但在2007年版中,仅“其余各系(Other Societies)”和“总计(Total)”项下40个字数,就有4处与1922年中英文版本不一致且数据本身难以自洽,其中包括:“1 431”误作“1 451”,“24”误作“21”,“6 562”误作“6 502”,“398”误作“308”。^⑤通过对1922年中文版相关印刷字迹的复核,前述问题基本可以判断为新版表格整理过程中因所据旧版本字迹模糊或抄录疏忽而产生的错误。

以上后期版本中的传抄舛误显然是在电子计算机尚未推广、数字化检验等技术有限的条件下,手动抄写、特别是原版材料清晰度欠佳之时,容易出现错误;加之当时对材料的处理以文字翻译为目的,故相关数据问题未能被及时校正。

总的来看,《基督教调查资料》数据在统计、计算、抄录、核验等多个环节均存在问题,从而影响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同时期的制度环境、方法应用、技术手段等因素密切相关。对《基督教调查资料》相关数据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与校勘有助于更好地利用这份资料,也为同时期其他统计数据资料的整理和利用提供有益借鉴。

三、以《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为例的数据分析与校勘

通过对《基督教调查资料》1922年英文版、1922年中文版、1987年版和2007年版的比照可知,第三部分《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各个版本^⑥的数据存在相当比例的问题或差异,加之《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的内容覆盖区域较完整、数据类型丰富、数据存在问题多样,具有一定典型性,故将其作为案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汉译本新版序言”。

②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344.

③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7编,第13页。

④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第696页。

⑤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下),第868页。

⑥ 该部分在各个版本中名称略有差别,2007年中文版名为《第三章 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1922年中文版称《第三编 各省份之基督教势力》,1922年英文版名为 Part III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the Provinces*。

例进行数据校勘。《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存在差异的数据主要分布在中各个省份的第一表“外国职员表”、第二表“中国职员表”、第三表“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和第四表“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教会学校表”,下文将对相关问题数据的问题展开具体分析,并以表格把各版存在差异的数据和最终的校正值一一列出。

(一) 外国职员表

1922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七节第一表为湖北的“外国职员表(Force at Work-Foreign)”,^①其美圣公会的护士为2人,女职员总数为43人;在1922年中文版对应的表格中,^②湖北美圣公会的护士为2人,美圣公会女职员总数为43或46人(因印刷字迹模糊难以确认);而在1987年版相应表格中,护士为3人,女职员总数为46人;^③在2007年版相应表格中美圣公会护士数和女职员总数与1987年版相同。^④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有两种,一是1922年中文版、1987年版和2007年版先后对数字进行了修正;二是在传抄和翻译过程中出现了错误。1922年中文版译自1922年英文版;1987年版也只是对1922年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文字进行翻译和修订,并不涉及数字的考证,所以前述数字的差别应当与考证或修正无关。实际上,1922年英文版湖北的“外国职员表”中各项数字均能自洽:美圣公会的护士数量与其他宣教会护士数量之和与护士总数相符;美圣公会女职员总数与其他宣教会女职员总数之和与“女职员总数”相符;而美圣公会女职员总数和男职员总数相加也与美圣公会“外国职员总数”相符。这说明,1922年英文版的统计数字是可以自我契合的;问题应当出在印刷和传抄过程中,即1922年中文版在该项表格中出现印刷模糊或错误,1987年版并未利用1922年英文版对1922年中文版的数字进行核对,反而累积并新增了错误;而2007年版则延续了1987年版的错误。

表1 各版“外国职员表”数据差异及校正值

序号	省份	内容	1922 英	1922 中	1987	2007	校正值
1	湖北	美圣公会护士数	2	2	3	3	2
2	湖北	美圣公会女职员数	43	43 或 46 ¹	46	46	43
3	甘肃	外国男职员总数	29	29	23	23	29
4	甘肃	外国女职员总数	43	43	45	45	43
5	江西	差会无正式布道事业或教会团体的女职员数	10	10	10	40	10

资料来源:根据《基督教调查资料》1922年英文版、1922年中文版、1987年版和2007年版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所得。

注:1. 湖北的美圣公会女职员数为43或46人,1922年中文版清晰度欠佳难以确认。

1922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八节第一表为“甘肃省教会外国职员表(Force at Work-Foreign)”,^⑤其外国职员总数一栏的男职员总数为29人,女职员总数为43人;在1922年中文版的同一表格中,^⑥外国职员总数一栏的男职员总数为29人,女职员总数为43人;但在1987年版相应表格中,男职员总数为23人,女职员总数为45人;^⑦2007年版相应表格中的数字与1987年版相同。^⑧1922年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各项数字均可以自洽,那么甘肃只能是和前述湖北的情况类似,即1987年版所呈现出的差别应当就是出在翻译和传抄过程中错误;而2007年版则延续了相关错误。

1922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九节第一表为“江西省教会外国职员表(Force at Work-Foreign)”,^⑨

①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105.

②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3编,第71页。

③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第234页。

④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300—301页。

⑤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115.

⑥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3编,第84页。

⑦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第256页。

⑧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325页。

⑨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123.

其差会无正式布道事业或教会团体者一栏的女职员数为10人;在1922年中文版的同一表格中,^①这些差会的女职员数为10人;在1987年版的同一表格中,这些差会的女职员数也是10人;^②而在2007年版相应表格中,^③这些差会的女职员数为40人。1922年中文版和英文版以及1987年版的各项数字均可以自洽,那么江西只能是和前述湖北、甘肃的情况类似,即2007年版所呈现出的差别应当就是出在翻译和传抄过程中错误。

(二) 中国职员表

1922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六节第二表为“湖南省教会中国职员表(Force at Work-Chinese)”,^④其中北长老会的在职受薪中国职员数为211人;在1922年中文版的同一表格中,^⑤其在职受薪中国职员数同样是211人;在1987年版的同一表格中,在职受薪中国职员数也是211人;^⑥但在2007年版相应表格中,^⑦这一数字为122人。1922年中文版和英文版以及1987年版的各项数字均可以自洽,而2007年版中“122人”与其它宣教会人数之和却与总数不符。那么湖南只能是和前述湖北、甘肃的情况类似,即2007年版所呈现出的差别应当就是在翻译和传抄过程中的错误。

表2 各版“中国职员表”数据差异及校正值

省份	内容	1922 英	1922 中	1987	2007	校正值
湖南	北长老会在职受薪中国职员数	211	211	211	122	211

资料来源:根据《基督教调查资料》1922年英文版、1922年中文版、1987年版和2007年版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所得。

(三) 基督教团体表

1922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七节第三表为“湖北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Extent of Occupation-The Christian Community)”,^⑧其“主日学校学生”(Sunday School Scholars)一栏内,主日学校学生总数(Grand Total)为9 339人,1922年中文版表格^⑨、1987年版相应表格^⑩和2007年版中对应表格中^⑪的主日学校学生总数与1922年英文版相同。但通过对1922年英文版该表中各宣教会主日学校学生数进行加总,得到的数字却是10 339人。对于总数(Grand Total)与加总数所呈现出的1 000人的差别,较为合理的解释显然是1922年英文版的数据整理者在对各宣教会主日学校学生的原始数字进行加总时,于计算中进位时出现了错误。同时,还可以发现,湖北省“基督教团体表”中有2个教派“回报不完备”和2个教派“无回报”,经济发达、基督教势力较大的湖北数据尚且如此,可见这份资料的统计完备程度受到一定局限。

1922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八节第三表为“甘肃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Extent of Occupation-The Christian Community)”,^⑫其中协同公会的教会全体总数(Total Christian Constituency)为425人;1922年中文版对应栏目中的数字与前者相同;^⑬但在1987年版中,该项数字是42人;^⑭而

①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3编,第90页。

②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第271页。

③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344页。

④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97.

⑤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3编,第59页。

⑥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第214页。

⑦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277页。

⑧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107.

⑨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3编,第72页。

⑩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第238页。

⑪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306—307页。

⑫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115.

⑬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3编,第84页。

⑭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第257页。

2007年版中,该项数字同为42人。^①1922年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各项数字均可以自洽,而1987年版中“42人”与其他宣教会人数的加总数却与总数不符。对于1987年版与此前版本所呈现出的差别,合理的解释就是因在翻译和传抄过程中漏抄而出现的错误;而相关错误则被2007年版所继承。

表3 各版“基督教团体表”数据差异及校正值

序号	省份	内容	1922 英	1922 中	1987	2007	校正值
7	湖北	主日学校学生总数	9 339	9 339	9 339	9 339	10 339
8	甘肃	协同公会的教会全体总数	425	425	42	42	425
9	江苏	正式教堂总数	314	314	314	314	307
10	广东	初级小学总数	675	675	675	675	674
11	山东	英浸礼会正式教堂数	345	345	345	349	345
12	山东	圣道公会正式教堂数	55	55	55	59	55
13	四川	教会全体总数	32 942	32 942	32 942	32 942	33 181

资料来源:根据《基督教调查资料》1922年英文版、1922年中文版、1987年版和2007年版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所得。

1922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十节第三表为“江苏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Extent of Occupation-The Christian Community)”,^②其“正式教堂”(Organized Congregations)一栏内,正式教堂总数(Grand Total)为314人,1922年中文版表格、^③1987年版相应表格^④和2007年版对应栏目中^⑤的数字与1922年英文版相同。但通过对1922年英文版该表中各宣教会正式教堂数量进行加总,得到的数字却是307个。对于总数(Grand Total)与加总数所呈现出的7个教堂的差别,尽管有可能是在1922年英文版的排印中某个宣教会的正式教堂数被遗漏导致总数大于加总数,但考虑到各宣教会正式教堂的数量是总数(Grand Total)的基础和来源,则更为合理的解释是1922年英文版的数据整理者在对各宣教会正式教堂的原始数进行加总时,于计算中错误地对伦敦会(7座正式教堂)的数字进行了重复加总。同时,江苏省“基督教团体表”中“回报不完备”的教派高达13个,经济发达、基督教势力较大的江苏尚且如此,可见这份资料统计完备程度明显受限。

1922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十二节第三表为“广东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Extent of Occupation-The Christian School)”,^⑥其初级小学总数(Grand Total)为675人;1922年中文版表格、^⑦1987年版相应表格^⑧和2007年版中对应栏目中^⑨的数字与1922年英文版相同。但通过对该表中各宣教会“初级小学校数”进行加总,得到的数字却是674。尽管有可能是某个宣教会的初级小学校数在排印中被遗漏导致总数大于加总数,但考虑到各宣教会的数量是总数(Grand Total)的基础和来源,则更为合理的解释是1922年英文版的数据整理者在对各宣教会初级小学校的原始数进行加总时,在计算时错误地对其中一个初级小学校数量为1的宣教会进行了重复加总。

1922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十五节第三表为“山东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Extent of Occupation-The Christian Community)”,^⑩其中英浸礼会和圣道公会的正式教堂数分别为345和55;1922年中文版对应栏目中的数字与前者相同;^⑪1987年版中相应的数字也与1922年中英文版相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327页。

②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141.

③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3编,第109页。

④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第303页。

⑤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382—383页。

⑥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171.

⑦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3编,第141页。

⑧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第354页。

⑨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448—450页。

⑩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204.

⑪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3编,第178页。

同;①但在2007年版中,这两项数字分别是349和59。②1922年中文版和英文版以及1987年版的各项数字均可以自洽,而2007年版中349和59与其他宣教会正式教堂的加总数却与总数不符。合理的解释就是2007年版因所拍照片字迹不清、抄录疏忽等原因而出现的错误。

1922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十七节第三表为“四川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基督教团体表(Extent of Occupation-The Christian Community)”,③其“教会全体”(Total Christian Constituency)一栏内,教会全体总数(Grand Total)为32 942人;1922年中文版表格、④1987年表格相应数字⑤和2007年版中对应栏目中⑥的数字与1922年英文版相同。但通过对1922年英文版该表中各宣教会“教会全体总数”进行加总,得到的数字却是33 181个,即加总数比总数(Grand Total)多出239个人。实际上,美基督会的教会全体总数即为239人,故对于总数(Grand Total)与加总数所呈现的差别,合理的解释是1922年英文版的数据整理者在对各宣教会“教会全体总数”的原始数据进行加总时,于计算中遗漏了美基督会的教会全体总数。同时,与湖北、江苏等情况相似,四川省“基督教团体表”中仅17个教派,其中就有6个教派“回报不完备”和1个教派“无回报”,由此使得资料完备性明显受限。

(四) 教会学校表

1922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七节第四表为“湖北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教会学校表(Extent of Occupation-The Christian School)”,⑦其中,中学女生总数为118人,挪路德会的中学以下教会学生数为399人;1922年中文版对应栏目中的数字与前者相同;⑧在1987年版中,中学女生总数却是119人,尽管挪路德会的中学以下教会学生数仍为399人;⑨更特别的是,在2007年版中,前项数字仍是119人,而后者则变成了395人。⑩1922年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各项数字均可以自洽,但1987年版中119人与各宣教会中学女生的加总数不符,合理的解释是1987年版在翻译和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而2007年版延续了这一错误。不仅如此,1922年中文版和英文版及1987年版中,其他宣教会的中学以下教会学生数均为399人且可以自我契合,但2007年版却为395人且表内数字难以自洽,此则应当是2007年版在表格重制过程中延续旧版错误的同时新增的一处错误。

表4 各版“教会学校表”数据差异及校正值

序号	省份	内容	1922 英	1922 中	1987	2007	校正值
14	湖北	中学女生总数	118	118	119	119	118
15	湖北	挪路德会中学以下教会学生数	399	399	399	395	399
16	江西	浸礼会的初级小学男生数	155	155	156	156	155

资料来源:根据《基督教调查资料》1922年英文版、1922年中文版、1987年版和2007年版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所得。

1922年英文版中,第三章第九节第四表为“江西省基督教事业范围中之教会学校表(Extent of Occupation-The Christian School)”,⑪其中浸礼会的初级小学男生数为155人;1922年中文版对应栏

①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第423页。

②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532—533页。

③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227.

④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1922年中文版)第3编,第203页。

⑤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第469页。

⑥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587页。

⑦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109.

⑧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1922年中文版)第3编,第72页。

⑨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第241页。

⑩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311页。

⑪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1922 Edition, p. 129.

目中的数字相同;①但在1987年版中,浸礼会的初级小学男生数为156人;②而2007年版中该项数字同样为156人。③根据1987年版翻译组织者荣孟源的说法,包括第三章“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在内的第二至七章基本上采用的是1922年中文版内容;④查阅1922年中文版可知,由于部分数字印刷质量一般,导致对应栏目中的数字“155”十分模糊,确实可能误作“156”。故对于2007年版与此前版本所呈现出的差别,合理的解释是因在表格重制过程中因版本质量一般或录入疏忽而出现的错误。

通过对1922年英文版、1922年中文版、1987年版和2007年版的分析可以发现,《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的数据在搜集、整理和流传过程中,在外国职员表、基督教团体表、教会学校表以及中国职员表中确实明显存在统计误差、计算错误、传抄舛误三个方面的问题。利用不同版本数据对照的方法并参考相关资料,对这部分数据进行校勘,使得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得到增强,也为接下来对《基督教调查资料》其他部分展开校勘提供了参考范本。

四、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到如下认识:

第一,确实存在因统计制度或方法而产生的数据误差或缺陷,这种问题主要出现在1922年英文版和中文版两个早期版本中。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最初的调查统计制度设计即存在一定局限,具体包括人员配置不足且以收集各地既有的数据为主,较少展开直接的调查,使得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明显受限于各地宣教会统计制度完善状况和对这项调查的积极程度;同时,存在数据统计标准不一致的问题,部分指标的统计口径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第二,因技术手段不足产生了相当比例的计算错误,计算错误主要产生和出现在1922年英文版和中文版两个早期版本中,且相关错误被此后的1987年版和2007年版所延续。这类明显的计算错误除计算中的疏忽等人为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即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对基督教调查中所获取的数据尚缺乏足够的技术手段进行整理和校验。

第三,数据流传中产生了不少抄录舛误。1987年版延续了1922年版本中的错误,且新增了相当数量的抄录舛误;而2007年版延续了1987年版的错误或缺陷并新出现为数不少的错误。首要的原因在于,1987年版和2007年版译者要重点完成的工作是高品质的文献翻译而非数据整理和校验;第二,1987年版译者开展翻译和表格重制的年代尚无充足的、以技术手段对数据展开校验的外部条件;第三,1922年中文版的印刷质量较为一般,存在不少模糊不清的数字,而1987年版译者基于1922年中文版中的数据重制表格时可能误读相关印刷模糊的数字,且1987年版和2007年版均未追溯至1922年英文版进行全面的数字核对。

尽管长久以来《基督教调查资料》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获得较高评价,然其中有着不少疑问尚存的地方。各个版本在统计误差、计算错误、传抄舛误等方面所呈现出的问题,一方面跟调查统计制度和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特定时期印刷技术和数据校验技术条件的限制,还与译者在翻译传抄过程中对版本的认识和甄选密切相关。上述问题的存在,显然为那些利用相关数据而展开的经济史或其他方面的研究带来一定风险,这也使得通过各个版本的比较对所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对相关数据进行检验和校正的重要性被凸显出现。同样重要的是,那些受到时代外部技术条件影响而产生的问题,也出现在了同时代的一些社会调查和统计数据中。故这项工作既使得基督教调查资料的数据可以更好地在研究中被利用,也有助于加深对近代中国社会调查资料相关数据的理解。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3编,第96页。

②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上),第279页。

③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第353页。

④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1901—1920)》(上)“汉译本新版序言”。

Analysis and Corrections to Data of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Wu Lingfei

Abstract: The survey data, named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on the numerical strength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ristian forces made by 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from 1918 to 1921.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there are five editions on the survey data up to n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among 1922 Edition (English), 1922 Edition (Chinese), 1987 Edition and 2007 Edition. Based on analysis and observ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urvey data of different editions has been effected by statistical deviation, miscalculation and transcription error. On account of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the Provinces*, this paper corrected related survey data based on different editions and materials. The Corrections are not only good for application of the survey data of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but also beneficial to analyze other social survey data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Christianity, Protestantism, Survey Data,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责任编辑:王小嘉)

《清代前期政府与北京粮食市场研究》出版

顺治元年(1644)清军攻入京城后,建都于北京。当时皇室和一些高级官员抢占了明末宫殿、高官住宅,而普通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大批军队及其家属则挤进土著居民住的四合院里。后来,政府下令内城原著居民全迁到城外,形成旗人、民人分别在内外城居住的情况。与此同时,继承明制,政府推行了漕运制度。漕粮运到北京后,会按官员级别被无偿分给官员和八旗官兵。外城的百姓则根据饮食习惯,在被保存下来的商品粮市场上购买由粮商从外地运入的粮食。由于清军还未进入北京时,政府曾禁止商民“于城内交易,但在城外互市”,因此当时很少有商人在内城建立商铺。但是有旗人分得粮食多,自家吃不完,便把剩余粮食卖给商人,从而在内城也形成了粮食市场。

本书主要从市场和政府两个角度探讨了北京的粮食市场运行规律,即政府与市场机制共同配置粮食资源。书中论述了市场的需求与供给、京城各类人的饮食习惯,决定着市场上粮食的种类与供求;梳理了粮食交易中粮商的交易方式、谋利方法等;呈现了在清代前期196年中京城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揭示了市场机制在其中起到的主要作用;分析了粮食市场运行的特点。此外,本书还论述了政府的作用。政府不仅继承明代的漕运制度,设立供给制度及分配制度,也参与了粮食交易,开设官米局,从事米粮交易,运用财政资金从京外地区采购粮食。政府对商人粮食交易等经营活动以及官员违规等问题进行监管,有一定的纠错能力。政府还通过平糶、改变漕粮发放时间等方式,调控粮价。本书最后论述政府对粮商以及市场的看法及其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市场是在私有制条件下进行的,政府的供给和分配制度,不在市场交易的范围内。但是政府通过制度安排配置资源,不仅参与粮食交易,而且监管市场、调控粮价。因此,在清代前期北京粮食市场中,既有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在其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不过,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不能单独解决京城的粮食问题,需要其共同起作用。值得提及的是,市场机制在其中起到了导向作用,政府的理念是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因此随着市场的变化,政府的制度、监管政策及落实行为、调控粮价等也随之改变,这一过程贯穿整个清代前期。(邓亦兵)